# 清代公羊说的理路、精神本质和价值
## ——读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

王记录

有清一代,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可是发达起来的却是相对理学而言的异端学说——号称“朴学”的清代汉学。而朴学在晚清也受到挑战,那就是同样来源于两汉但却又是以朴学异端出现的今文公羊学。于是清代学术便有了汉宋之争、今古文之辨,其间因师承与观点的差异,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学派,但这些学派之间关联之处又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而且,由于早在利玛窦、徐光启时代,“西学”已为有识见的中国士大夫所知,在清代,时隐时显,道咸以后,更以新的姿态跃出,成为任何学派都不能置诸不理的学术上参照,清代学术便又有了不同于先前的特点。况且,清朝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封建帝国的没落必然在学术有所反映,但帝国的没落又不等于学术的没落。在整个封建制度日薄西山的情况下,学术也在悄然发生嬗变。嬗变的形式是多样的,有总结,有批判,有探索,更有旧瓶装新酒,等等。

大约正是由于清代学术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且又影响深远,故而近代以来诸大家均对清学史给予了极大关注。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钱穆、陈寅恪、柳诒徵等,都对清学史进行过讨论,或宏观考察,或微观研究,精义纷出。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由于他们各自所承的学术渊源及引用的参照系很不相同,故而对清代诸学说的估计差异也就特别大。清代学术本身的纷繁复杂以及近代诸大家极不相同的评价,自然会引起后人对这段学术的不断探求。而这种探求要想取得对清学史的真正理解,从而有所突破,则必须打破那种现实与历史、主观与客观纠葛不分的局面,超越学派的门户之见,撇开一切功利的因素,直接从最原始的矛盾冲突中清理出清学史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认识在中国经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其泰先生所著《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 1997 年 4 月版)便是一部确有见地的研究清代学术的专题性著作。该书不是研究清学史的全部,而是选择了很少有人加以深究的、率多“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学说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极具识力。在清代,公羊学说是以朴学异端的面目出现的,至晚清,又与西学相接,悄然向近代学术嬗变,研究它,必然带动对清代朴学、西学、学术嬗变以及各个学派之间不同观点的研究,或至少提供某种参照 。而且,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公羊学说是今文经学派的中坚,在儒家经典中独树一帜,曾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两汉与晚清两次风行天下,掀起过学术波澜和政治波澜。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其意义当然又不仅仅在于对清代公羊学演变过程的厘清,而是从政治与学术两个层面探触到晚清社会变动和学术变迁的深层了。

清代公羊学说有自身的发展理路,但如深究下去,就不能不涉及最原始的问题。作者明显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书中所论以清代为主,但上探公羊学说之源头,将其发展演化打通,全面而系统地对公羊学说历史统绪进行了一次梳理。公羊学说以讲论“微言大义”为表征,故而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夸诞、空虚、神秘便显现出来,而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反遭蔽障。加之每位公羊学者不同的个人特点和身处不同的时期,其对公羊学基本命题的阐发也就各具特点,有的喜聚材料,义例繁多;有的文词佩诡连犿;有的好用典故;有的喜欢肆意发挥。对此,作者进行了细密的微观研究,爬梳剔抉,考证辨伪,钩稽贯串,彰显他们的学术个性,刻意发掘怪诞形式之下的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同时,作者又超越就事论事的局限,从文化的演化及其根基变异的角度,坚持从历史说明历史,宏观地把握了公羊学说逻辑展开的历史过程。可以说,作者在书中所进行的乃是考证钩稽与义理阐发的双向诠释,既把握发展大势,又细论每一个环节,从而凸显出清代公羊学的理路、精神本质和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公羊学说的精蕴长期令人难以索解,究其原因,大约有二:

其一,就公羊学说本身来讲,它专讲“微言大义”,其学说核心是《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解释。后经董仲舒、何休诸人推演,遂形成一套系统的命题,诸如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以《春秋》当新王,内诸夏而外夷狄,绌夏、故宋、新周,等等,构建起公羊学说颇为复杂的理论体系。由于公羊学说是在推求《春秋》笔法义例基础上形成的,重发挥,轻史实,再加上又被董仲舒等人灌注进大量的阴阳灾变思想,其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看法,具有进步性,富有深刻哲理性的学说精华,被深深掩在了附会穿凿、烦琐空虚、阴阳灾变的表面形式之下,没有一定的学术眼光,自然难以将精华与糟粕区分开来。

其二,就学术传统来讲,华夏文化具有史官文化的特点,重历史记载,重述而不作,酷爱注释经典,从字音、字义、礼制、典故方面一代一代不知疲倦地作注解。

这种崇实黜虚的特点，不仅形成传统史学的发达，而且形成东汉以后专重文字训诂的古文学长期在学术上居于正统独尊的地位，至清代朴学风行而达于极盛。一直到近代，新考证学派仍在学界占重要地位。因为此，学者多以古文经学的眼光看待公羊学说，对公羊学说的理路不得而知，故而无法窥其堂奥。门户之见遮掩了学人的眼光，揭示公羊学怪诞外衣下的精神本质，也就无从谈起。

很显然，要探寻公羊学说的理路，揭示其怪诞外衣下的真精神和真价值，必须转换视角，抓住关键。《清代公羊学》一书在这点上有很大突破，首先，作者超越传统的今古文经学争论，摒弃一切门户之见，以现代学术眼光，从文化史的角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仔细寻绎公羊学家的论著，从而获得了对诸多问题的新解。比如，章太炎站在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上，在《检论·清儒》中深诋龚自珍、魏源。作者深入分析了章氏的治学特点和学术立场，指出章氏没有认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变局，且又固守古文经学的门户，当然就无法理解龚自珍、魏源运用公羊学说批判封建专制的历史性贡献。其次，作者把公羊学的基本命题当作理解公羊学说的钥匙，深入探究和诠释。这一做法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一代一代的公羊学者就是靠推演这些基本命题而将公羊学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的。不抓住这些基本命题，就无从梳理公羊学的演化过程。

公羊学说有很多命题，但对后世有影响，并经常被人拿来阐发的，也只有几种。作者概括出四种，阐幽发微，披沙拣金，大力彰显其优秀的价值。它们是：(一)“大一统”以及此一观念下强调全中国范围内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意义；(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此一观念下以文明道德而不是以种族血统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和夏夷互变的有利于民族交流和进步的光辉思想；(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三世说”朴素进化观以及其中包含着的极其宝贵的历史变易观点；(四)“拨乱反正，以俟后圣”以及此一观念下为后王制义法的政治意义。这四个命题是公羊学理论体系的主干，后世公羊学者根据时代需要，选择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屡屡加以发挥，而这些命题也就在不断地被发挥过程中悄然改变着内涵。作者将这些命 题的优秀部分发掘出来，使我们得以窥见公羊学说的真相。在把握了公羊学说的基本命题以后，作者又揭示出公羊学说独特风格的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性。公羊学视《春秋》为一部政治书，讲“改制”，尊奉王权，主张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其二，变易性。公羊学有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是变易的，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思想内核是朴素进化观，为“改制”的主张提供哲学基础。其三，解释性。公羊学说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用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这在时代激烈变动的时期更便于容纳新思想。作者的这一研究结果意义重大，公羊学说之所以能与现实社会需要易相联系，都是它的这些特点在起作用。

和任何学说一样，公羊学也有自身演化的理路。但是，公羊学的历史命运又近乎离奇，它在两汉与晚清两次风行天下，掀起学术波澜，中间却澌灭殆尽千余年。研究公羊学的演化，不能不分析这一奇异的历史现象。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作者在摆脱门户之见后，又超越前人就公羊学本身论公羊学的做法，用上下贯通的历史眼光，将公羊学说的发展演变与现实社会的变动结合起来，在社会与学术互动的基点上进行双向考察，指出公羊学说在两汉第一次大盛，正当秦末大乱以后，统一国家刚刚建立，新的封建关系处于 确立过程，需要一种要求变革，积极干预政治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而公羊学倡导大一统，尊奉王室，拨乱反正，则恰恰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加之董仲舒等人的大力彰扬，遂使公羊学说成为西汉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官方哲学。自东汉末至清中叶，公羊学沉寂千余年，从学术自身的发展来讲，公羊学说讲《春秋》义法，繁琐而怪异，董仲舒又将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注入其中，穿凿附会，影响人们接受，加之东汉末年郑玄遍注儒家经典，主古文家说而兼采今文，实际上是把今文家说统一于古文之中，重史实、重考证的古文经学抬头，并走向独尊，公羊学盛极而衰。从社会现实来讲，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演进过程趋于平缓，是维持已有的封建体制的时期，主张尊古、倾向保守的古文经学更适合于作为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而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失去了市场，也势属必然。历史发展到晚清，时代剧变，民族的命运要求打破现状，革除积弊，认识亘古未有的变局，阐释变革、变易的公羊学说又变为新的需要，它在晚清公羊学者的改造发展下，再度盛行，并达于辉煌。作者从社会与学术互动的基点上考察公羊学说的变化，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因为公羊学说的本质就是发挥义理，比附现实，离开与现实的联系，不唯读不懂公羊学，更难以梳理其发展理路。

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演变是作者研究的重点。著者指出，清代公羊学由重新提起——张大旗帜——改造发展——达于极盛，是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展开。作者运用历史的方法考察了这一过程，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细绎作者的研究，笔者发现，作者向人们揭示的清代公羊学的演化理路是：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公羊学不断被先进思想家改造、推进、不断吸纳新思想，与现实的结合愈来愈紧，最终掀起政治波澜和学术波澜。清代公羊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与现实结合的过程，公羊学说一离开现实，便没有前途。依照这样的标准，作者对清代诸多公羊学者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揭开了它们环环相扣、不断推进的演化主流，同时又注意到这一演化过程中的回流。

作者指出，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是清代公羊学的主将和功臣。庄存与续接董仲舒、何休的家法,并探触到公羊学说"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等基本命题,是重提公羊学说的关键人物。但庄存与生活在乾隆盛世,其学说具有拱卫王室的特点,对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理解不深。刘逢禄续接庄存与,更具创造性,继续阐发公羊学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核心问题,尤其重视阐释以三世说为中心的变易观点,大力彰扬公羊学微言大义以经世的意义,是张大公羊学旗帜的人物。刘逢禄的公羊学说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他虽然讲变易、因革,但仍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旨归,缺乏批判现实的精神。龚自珍、魏源均受刘逢禄奖掖,由于他们生活在嘉道时期,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显露,危机四伏,他们耳闻目睹这一现状,大声疾呼挽救社会危机,对公羊学说加以改造发展,将其变为议论变革的思想武器。他们高扬公羊学的历史变易观,猛烈批判当时为封建衰世,关注现实,倡导改革,为危机时代找出路。自龚、魏开始,公羊学说便与改革封建弊政、变法图强的事业紧密相结合。龚、魏显然是改造发展公羊学说的关键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学说又承袭龚、魏而来,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康、梁生活的时代,民族危机深重、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康有为高扬公羊学变易观和三世说,揉合《礼运》篇"大同"、"小康"思想,并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进化论结合,构建了从"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将来实现"太平世",即"大同世"的人类社会进化模式,并由此论证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的新三世说是天下万国共同的规律,从而形成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掀起维新运动。通过作者的这一考察,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从庄、刘的发挥经义,到龚、魏的以经议政,再到康、梁的政治行动。晚清公羊学所走的正是与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当年董仲舒等人为封建君主专制所铸造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武器,才被康有为等人改造成替封建政治体制掘墓的工具。思想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晚清公羊学发展的主流中也有种种回流,作者对它们的分析同样是发人深思的。在公羊学被重新提起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孔广森、凌曙、陈立三人讲公羊但并不真正懂公羊。孔广森不守公羊家法,另立三科九旨,抹杀今古文界限。凌曙罗列众说,缺乏断制,舍本求末。陈立不明白公羊学的精髓在于变。他们都未能将公羊学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缺乏时代气息。在公羊学被改造发展到达于极盛的过程中,戴望、王闿运、廖平在学说传衍上有继承之功,保持了公羊学薪火不绝,但他们缺乏创新,没有时代感,对外部世界的危机没有反应。廖平治学善变,在前期有积极影响,但越变越离奇,终因脱离时代主流,矜奇炫异,穿凿附会,成为一个"方士"式的人物。这些结论不仅新颖可喜,而且从反面说明了,不明白公羊学说包含的讥议时政的精神,不将公羊学与时代变革相联系,而只是聚材料、搞经注,象古文经学一样进行纯学术的研究,只能窒息它的生命。

中国的学术文化,大体以本世纪初年为分界,以前的称为"旧学"或"传统文化",以后的称为"新学"或"近代文化"。人们每每有一种误解,似乎"新学"或"旧学"之间有一个断层,二者对立。"传统的"即是封建的,"近代文化"是从外国移植的。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新学是伴随着吸收西方进化论、猛烈批判旧学而诞生的。对旧学的猛烈批判掩盖了新学与旧学的联系,致使人们产生了模糊认识。显然,这一问题需要澄清。对此,《清代公羊学》一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揭示了公羊学说在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化中的作用。

作者指出,近代西方观念的输入,必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其接合点,否则不可能在本土生根,而公羊学说专讲"微言大义"的特点正好能容纳西方传入的新观念。作者从政治与学术两个层面上考察这一问题。从政治层面上说,公羊学对促使维新变法的开展、推动晚清社会前进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一作用随着变法失败而成为过去。从学术层面上讲,公羊学说影响则非常深远,在哲学和史学领域发挥作用。在哲学领域,晚清公羊学朴素变易观成为它接纳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成为沟通 19、20 世纪之交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最后,公羊学让位于进化论,而价值融入其中。在史学领域,晚清公羊学盛行形成了重新研究古代典籍和历史的普遍认识,从而促进了本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并且对于五四前后"古史辨"派考辨古史、探究可信的古史体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清代公羊学》在清学研究史上无疑应有其重要地位。笔者在拜读该书的过程中,除了对作者研究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以及其所揭示的公羊学说的精神本质和价值有所感悟外,认为以下几点还应特别提到:

其一,资料占有极为丰富。书中涉及 20 余位公羊学者,作者均详细占有资料,阐幽发微,钩稽贯串。如对公羊学基本命题内涵的解剖,既详尽又充实,征引繁富。对龚自珍、魏源的研究,涉及哲学、史学、批判精神、民主意识、改革思想、现实卓见等方方面面,作者广占资料,融会贯穿,极见学术功力。在深入研究个体的同时,作者又注重上下贯通,将死的材料理出鲜活的学说演进过程,而不是淹没在资料的汪洋大海中。

其二,新见迭出而又立论公允。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问题,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新见,但又立论持平,不眩人眼目,反映了良好的学风。如孔广森著有《公羊通义》,章太炎讲清代公羊学,以此书为重要著作,作者在对孔氏公羊成就深入辨析后,指出此书不具有进步性,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从而纠正了章氏谬说。这样的例子,书中甚多,不便一一枚举。

其三,文笔酣畅淋漓。作者有极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致使该书很有文采,读之不厌。这在学术史著作中不常见,因此值得提倡。